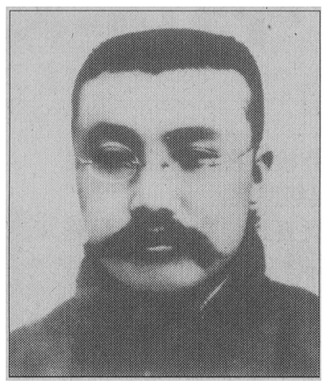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侯且岸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新文明，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观。这一社会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

从学理上探究社会主义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学理”上的探讨是从李大钊开始的。在他之前，尽管有些政治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著述片段式地译介过马克思的生平、社会主义学说，但这种一般性的介绍都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李大钊则不同，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追求是建立在对“学理”的探究之上的。他深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深刻的、准确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全面掌握的。我“拼上半生的工夫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文集》（下） 第46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注页数）。

对于社会主义学说，李大钊认为必须进行“学理”上的探究。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中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的宗旨说得很明白：“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史事综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86页）。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则设有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等研究组。

社会主义学说毕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异同，更有效地使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的新文明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等文章中，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涉及到的社会主义流派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外，还包括英、法等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空想社会主义鼻祖、英国人道主义者和文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艺术社会主义者、政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 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作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Saint 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 叶（Charles Fourier，1772—1873），法国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1811—1882）。

在上述人物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李大钊花费了很多篇幅，着力对19世纪英国的社会主义流派加以评论，而其中介绍得最为集中、最为详细的一位是约翰·罗斯金，其次是罗伯特·欧文。对欧文，人们比较熟悉，对罗斯金，人们比较陌生。据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巴克所著《英国政治思想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一书介绍：罗斯金“在传播为社会主义鸣锣开道的思想所做的工作超过任何其他英国作家”。罗斯金“宣扬在唯物主义时代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很有必要发现和信任明知的统治者” 他是“希腊经济学理论的信徒”，“抨击对财富的崇拜和对竞争的迷信”，主张“用合作（‘如同一家人一样’，柏拉图也是这样类比的）代替竞争”；他还“力求以道德来阐释政治经济学并给予政治经济学以应有的地位，即把它作为一门从属科学，忠实地为政治学这门主要科学服务”，并“同伦理学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很显然，罗斯金的社会主义学说带有浓厚的人本色彩。

李大钊对罗斯金的评价很高，称之为“英国之艺术的社会主义者”、“静的英雄”，与培根、卢梭“在思想界上打破悖谬间真理之路”，是“重道德、精神、艺术”的“人道社会改造家”。他指出，罗斯金“发明其艺术哲学与其社会改造结合之要领”，“如新之文艺复兴”（第411、415、416页）。李大钊尤其推崇罗斯金主张的“心物调和改造论”。他说：“马克思即主张阶级斗争，以为欲改良劳动者之生活，只在阶级斗争。此纯由物质方面去改造。托洛斯基（Tolstoy）主张从心的方面去改造。罗斯金（Ruskin）主张心物调节，故二者均须改造”（第425页）。他又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始至不能实现”（第67页）。李大钊还引用罗斯金的名言做《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的立论。该文的开篇语即是罗氏的话：“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李大钊认为，“这是互助的思想”，“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思想深受罗斯金学说的影响。他的“物心两面改造论”实际上源于罗斯金；他强调“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改造”、宣传“互助”思想，也是依据了罗斯金的学说。

应该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来看，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确实存在着一种令人憎恶的“庸俗唯物主义”倾向。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保尔·巴尔特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歪曲成为宿命论的谬说；也对有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唯物主义当成“套语”、“标签”，鼓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同时，恩格斯自己也公开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和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同唯心史观做斗争，他和马克思不得不强调被他们的论敌所否定的“经济决定论原则” 着重揭示政治、思想所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经济根源。这样，就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强调的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恩格斯致弗 梅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李大钊能相当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强调的不够”的“过错”，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某些“偏蔽”，强调新文明的建设既要进行物质的改造，也要进行精神的改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说明当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

“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们的实境”

在对发源于西方文明中的种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李大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是孤立的主观臆想，也绝非人间理性的升华，它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理论。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很注意研究唯物史观，在多篇文章中阐发了唯物史观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用唯物史观做指导，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演变和思想变动的内在原因。他认为，马克思虽没有专书论述唯物史观，但他的著作如《资本论》等确是“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阶级竞争说与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它是具体说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也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第55、60、63、64页）。他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的”。（第50页）李大钊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写出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他表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第184页）。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要有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必须要有各民族、各国的特色和异点。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使“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们的实境”。

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做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所有的物色亦岂可忽略”。他又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之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亦是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

李大钊指出：“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第334页）。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发生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要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就夺取政权来说，采取平和的手段往往流于失败，“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第611页）。但是，他也承认：“G.S.在英国带有平和性质，缺乏革命之性质。然在现代阶级斗争时代，想以平和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第375页）。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先进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享受着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李大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第670、671页）。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人与人之间是“互助、相爱，不是谋怨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第375页）。他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是十分充实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金钱主义气味”，促进文化艺术的真正发展，保存文化艺术的个性，“表现纯正的美”（第671页）。

第五，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自由同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

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和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标亦是这样。”他还说：“德谟克拉西（Democracy） 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第574页）。

李大钊特别谈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因此，“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第437、438页）。

党史札记之七十二



听毛泽东谈哲学（四）

王：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这本书里看到你谈到当时为说明毛主席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所写的一篇文章：《谈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其中说道：

《庄子·天下篇》记载的“辩者”关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是以朴素的形式，从量这一个侧面，说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光辉的思想。但是，如果不限于抽象的量的侧面的考察，而深入到具体的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那么，这个说法就不能充分说明“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了。

“半”，是个量的概念。“一”分为两“半”，事物在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量上小了一半。

量的分割，到一定的阶段，引起质的变化。

且不说棰失去一定的长度，就丧失了棰之为棰的性质。当物质的分割达到分子时，就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进一步“分”，就使分子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原子，原子不是半个分子，而是同分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原子进一步“分”，就分解为电子和原子核。电子和原子核都不是半个原子，而是同原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

如此类推。

物质的无限可分，并不是无限地、单调地重复某一种特定的“分”的形式。

在物质分割的每一个新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去探究前所未知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自然科学不断地有新的发展，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辩证法根本不容许把某种已知的刻板的公式，强加于自然界、强加于自然科学。

研究原子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经典物理学发展到量子物理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

“基本”粒子的“分”虽然现在物理学还没有把它研究得很清楚，无疑却预示着将会出现崭新的性质、形式和规律，研究它们，将会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龚：现在仍然有些同志怀疑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对“夸克”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夸克幽闭”的假说，按照这种假说，单个的自由的“夸克”不可能从幽闭它的空间中释放出来。有些同志据此认为，这就是“物质可分”的极限。但是在我看来，第一，幽闭说还只是假说；第二，这个假说的提出本身，即已显示出在这个关节点上的“分” 具有全新的、为过去所不了解的性质和形式。这正好说明了物质的不可穷尽性和深远的无限性。

回到介绍毛泽东当年谈话的话题上来。毛泽东说：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点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

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的哲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说》，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究竟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不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王：真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谈话。这么一篇重要谈话，就你们几个人听了？

龚：当天晚上，就让我向也在北戴河的彭真汇报了。回到北京，又向陆定一、向周扬汇报了。还在《红旗》编辑部作了传达。陆定一还要我在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有中宣部各处负责人和中宣部所联系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以可以记录下来的慢速度作详细传达。许多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又把他们记下的传达稿向自己部门和单位做了传达。当我传达到涉及傅鹰的那句话时，陆定一插了一句话：“傅鹰讲氢和氧不是简单的合二而一。他这话，讲得倒是有道理的。”并对在场的北京大学校长说：“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王：“文化大革命”期间，你的记录流传开来了。

龚：那时许多当权派的笔记记录和内部文件都被抄家拿走，红卫兵编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本子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许多谈话记录。在一些本子中，确实发现有我所作又经辗转传达的毛泽东8月18日关于哲学工作的谈话记录。有趣的是其中有一种纪录把陆定一插着讲的几句话也当作毛泽东的话了。

王：这是一个误传的趣闻。

龚：还有一个趣闻呢。“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出了一本范文澜的纪念文集，其中插有范的手迹照片。一幅手迹照片说是范听毛泽东谈哲学的纪录的照片。一看内容，就是1964年8月18日那次谈话，可那次并没有范参加。

王：那是怎么回事？

龚：看来是范听到传达，或者是从红卫兵印的流传本上抄录的。

王：有几种流传本？

龚：我看到三种。一种就是我当时整理的并在中宣部（还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作过传达的记录，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种是我在1966年春重新整理的记录，那时中宣部想编印一本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内部指示和谈话集，要把毛泽东这次谈话收进去。而我在1964年整理的记录稿被《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拿去，一时取不回来。我就据我的原始的笔记重新整理了一个记录，题为《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这个本子刚刚印成，中宣部就被当作“阎王殿”给砸烂了，这个本子也落到红卫兵手中。还有一种，看来是对第一种记录稿的进一步整理，有所压缩，并分列了三个小标题：“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关于社会发展问题”，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王：谁作的这个整理加工？

龚：我不知道。

吴江写过一本回忆录，说到1964年组织写“一分为二”文章的班子和毛泽东同这个班子谈话的事。他说：

“这次谈话，我请也是湖南人能听清毛的口音的龚育之作记录。他是当时在场的唯一记录人。我以为讲话记录只此一本，谁料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讲话记录比我们的要详尽得多，这才想起当时空荡荡的大厅中有录音装置。”

他这个猜测可不对。当时的确没有专门的记录人，除我以外，文章班子中别的人也可能有人作了简单记录。但是记录得最详细的，的确是惟有我一个，所以后来都是按我整理的记录传达。我的原始的笔记和两次按原始笔记整理出的记录稿，在毛泽东逝世后都提供给档案馆了。档案馆中别无更详细的记录。我已经向吴江说明了情况。

王：听说同你们谈话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同于光远和周培源谈过同样的哲学问题。

龚：那是8月24日，六天以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了。

王：你能介绍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吗？

龚：那次谈话的纪录整理稿，已经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了。

王：哦！那为什么毛泽东同你们那次谈话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

龚：看来《毛泽东文集》的编辑方针是只收那些正确或者基本正确、比较正确的重要文稿，反映晚期错误思想比较突出的，就不收了。同于光远、周培源的谈话，没有怎么多联系阶级斗争，多从认识论、自然辩证法展开讨论。而同我们的那次谈话，许多地方都是谈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四清”运动，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往前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往后同“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走资派” 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都有联系；而这三件事，在历史决议中已经判定都属于“左”的错误。所以，编者没有将这篇谈话收入文集。

王：主要是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和“四清”运动的估计问题。

龚：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的关系，讲哲学的那些规律和范畴，固然不无可以挑剔的不够周密的地方，总的说，应该认为是很有见地，很富于启发性，也很体现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独特风格的。

王：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 有点可惜。

龚：格于既定的体例嘛。改体例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要等条件成熟。不过，最近文献研究室正式出了《毛泽东文艺论集》，其中有一篇集纳的文献，题为《论〈红楼梦〉》 在这篇集纳文献中，就收了这次谈话中关于《红楼梦》的谈话。

王：同你们的谈话和同于光远他们的谈话，两次都与自然辩证法有密切关系，都提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坂田文章。

龚：坂田文章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复刊第一期（8月份）上刊登的。《毛泽东文集》收入同于光远、周培源的谈话，编者对谈话中提到的坂田文章作注，却注为：“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 这是注错了 应该改正的。

中国机械装备(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 Equipment Corporation Group
CNMEG
电话(Tel):86-10-68595793 传真 Fax:86-10-68521569
网址:Http://www.cnmeg.com 电子信箱:office@cnmeg.com